故乡文化对李大钊道德人格形成的重要影响

赵书昭

唐山“五种精神”大家谈

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说：“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与其人的体质、人格、教育、环境及一般的经验均有关系。苟欲澈知其人思想的由来，必须就其人的气质、品性、家系、血统乃至亲缘、师友，一一加以考察。”可见，一个人的思想成长和道德人格的塑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先驱，同时也是伟大人格的光辉典范，李大钊道德人格的形成离不开中国近代历史的巨大变迁，也离不开自身的主观性选择。西学东渐之风、科举考试的废止、新式学堂的建立、中国近代工业的发蒙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逐渐解体，都极大地开拓了李大钊的视野，赋予了他接触新知识、新思想的历史契机，为他日后最终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起到了更为直接的作用。当然，故乡文化对李大钊的影响则更为基础。李大钊少年时代是在故乡度过的，此时恰是一个人道德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是上底色和筑根基的重要时期。滔滔滦河、幽幽燕山、高耸之碣石、芳香之沃土、勤俭之乡亲、浓厚之乡情、浓郁之乡音、夷齐精神、燕赵风骨，无不浸润着李大钊年轻的心灵，滋养着他丰富的情感，铸就了他求真、向善、尚美的高尚人格和道德情操。

一、乐观雄健——故乡壮美山河的陶冶

在李大钊所留下的文字当中，描写故乡山水的有《游碣石山杂记》《五峰游记》《旅行日记》《自然与人生》等篇章。故乡山河的秀美与磅礴赋予了他乐观雄健的性格，大自然美好景色激发了他对祖国和生活的无限热爱，这些因素筑牢了他的精神之堤，使他立志为国家民族守卫自然家园和精神家园，为后世子孙创造无限美好的生活。

（一）感恩滦河，对新生活的乐观期待

滦河，古称濡水，是冀东平原的母亲河。它源自河北省巴彦古尔图山麓，流经内蒙古高原、燕山山脉至乐亭县的兜网铺入海，全长877公里，是一条多沙性河流。滦河在潘家口以北从燕山流出后就逐渐失去了落差，久而久之淤积成了水土肥美的冀东平原，但也将滦河变成了曲流摆动的游荡河，历史上多次改道。乐亭县全境无山，地势平坦，境内土地肥沃，水资源比较充沛，适宜农作物的生长，是冀东大地有名的“鱼米之乡”。李大钊在永平府中学读书时就开始泛舟于滦河之上。当时，滦河泛滥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乡民们对滦河也是爱恨交加，无可奈何。但是，李大钊却以更加积极和感恩的心态看待滦河，对未来的生活寄予了更多的期待。1919年，他在《五峰游记》中写道：“滦水每年泛滥，河身移徙无定，居民都以为苦。其实滦河经过的地方，虽有时受害，而大体看来，却很富厚，因为他的破坏中，却带来了很多的新生活种子、原料。房屋老了，经他一番破坏，新的便可产生。土质乏了，经他一回滩淤，肥的就会出现。这条滦河，简直是这一方的旧生活破坏者，新生活创造者。可惜人都是苟安，但看见他的破坏，看不见他的建设，却很冤枉了他。”虽然滦河时常暴发水患，但李大钊善于从积极的、历史的角度来认识滦河的作用，把滦河的水患看成是对旧生活的涤荡、对新生活的贡献。同时，他也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并没有被完全激发出来，对人民“苟安”的现状表示不满和痛心，因此他立志实现民族解放、振奋国群，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面貌和民众的精神面貌。

（二）取力滦河，汲取雄健的革命精神

1919年夏，李大钊在五峰山消暑，对泛舟滦河之上的心情与感受进行了记述：“山路崎岖，水路两岸万山重叠，暗崖很多，行舟最要留神，而景致绝美。”昔日的滦河河面宽阔，不乏急流漩涡、浅滩暗礁，加之当时的摆渡都是较小的木船，载客量有限，稍有不慎，就有翻覆的危险。但滦河留给李大钊的不是这种凶险莫测，而是勇于挑战艰难险阻的意志品质。因为李大钊深知革命的道路必定充满艰难险阻，甚至有身家性命之忧。但他没有畏缩，他知道这种艰难险阻必须依靠雄健的精神才能抵抗过去。对于李大钊而言，滦河行舟，九曲八弯，险滩急流，漩涡暗礁，险象环生，恰如他的革命生涯。而船上之人，犹如时代之弄潮儿，“走到崎岖的境界，愈是奇趣横生，觉得在此奇绝壮绝的境界，愈能感得一种冒险的美趣”。可见，李大钊将滦河行舟比喻为仁人志士救亡图存和实现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虽然国运艰难，但必须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曲，在悲壮的歌声中，走过崎岖险阻的道路。李大钊寄情山水之间，绝非仅仅抒发个人豪情，更非顾影自怜、孤芳自赏，而是始终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

（三）寄情于碣石五峰，积蓄革命力量和豪情

乐亭县处于滦河入海之前所形成的冲积平原，全境无山。李大钊却生来对山独有情愫，“予性乐山，遇崇丘峻岭，每流连弗忍去”。碣石山，位于昌黎县城北，由近百座连绵的山峰组成，方圆数十里，主峰娘娘顶（亦称汉武台）海拔695米。李大钊与碣石山有过数次交集，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足迹。一是寄情于碣石，积蓄精神力量。1913年9月，李大钊携几位好友游历碣石山。此时李大钊刚刚大学毕业，昔日同窗各有归处，自己却常感报国无门，心情暗淡忧郁。与友人游历碣石山，寄情山水之间，抒发情感，调整心绪，重新积蓄精神力量。同年冬，李大钊得到资助东渡日本留学，开启了新的征程。二是盟誓于碣石，激发爱国反帝精神。1913年9月11日，在昌黎驻军的2名日本士兵无礼殴打中国小贩，遭到昌黎火车站路警杨桐秋的制止，日本士兵遂与中国路警发生冲突。后日本驻军倾巢出动围攻铁路警察局，枪杀5名无辜路警。不仅如此，日方还胁迫昌黎县知事王芝田在歪曲事实的文稿上签字。此事对李大钊刺激极大，发誓“与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三是避暑于碣石，书写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历史篇章。1918年夏，李大钊来到五峰山避暑，潜心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后来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标志着他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四是避难于碣石，继续革命伟业。1919年夏，李大钊携子葆华来到五峰山韩文公祠避难，其间撰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与胡适进行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1924年，李大钊为躲避北洋政府通缉，再度来到五峰山避难，强忍爱女钟华早夭之痛，寄家书一封，奉劝妻子打消求救于白坚武的想法，与白氏彻底绝交。后来他辗转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五大，继续从事伟大的革命事业。可以说，碣石山的确是李大钊一生中思想发展脉动的见证者，也是他一生中重要事件的见证地。

需要说明的是，故乡文化和具体环境毕竟属于外在因素，一个人道德人格的形成是外在环境作用和个人主观选择双向作用的结果。同乡、同学之间人生选择大相径庭者比比皆是。李大钊之所以能成为革命先驱，其根源在于其个人树立的救国救民的坚定信仰和远大志向，并一生矢志不渝。否则，碣石再美也不过是士子文人抒发风花雪月和个人情感的对象，滦河再汹涌也不过是给人以惊险刺激或心有余悸而已，缘何李大钊就能够舍弃这些狭隘情愫，从山川壮美中汲取革命力量和革命豪情，去奋力创造新生活呢？这就要从他的主观世界去寻找答案了。

二、勤俭重文——乐亭家乡文化的熏陶

乐亭县位于唐山市东南部，北仰燕山，南望齐鲁，东连秦榆，西眺津京。境北有滦河横贯，与昌黎县为邻，东南濒临渤海，西与滦南县、唐海县（今曹妃甸区）接壤。乐亭县商周时期属孤竹国，秦时为辽西郡，汉代时名“乐安亭”，北魏时期改称乐安镇，金天会元年（1123年）始置乐亭县，已有900余年的历史。乐亭大地哺育了李大钊，乐亭人也以李大钊为骄傲。一口地道的“老呔儿话”，一曲难忘的“老呔儿影”，是乐亭人民的精神标识和心灵家园。乐亭人民勤劳节俭、吃苦耐劳、重视文教，乐亭县域文化为李大钊铸就了不可磨灭的精神底色。

（一）“呔商”有勤劳简朴、吃苦耐劳的文化基因

历史上滦河经常泛滥，水患经年，百姓束手无策，苦不堪言。清朝时官府为增添税赋，允许关内人赴关外谋生，因此，许多乐亭人开始“闯关东”，初期多为贩夫走卒，走街串巷，沿街叫卖，后来逐步发展到开设店铺、作坊、粮栈、货栈甚至从事钱庄、银行等金融行业。到清末民初时期，乐亭人在东北形成了“老呔帮”，买卖人被称为“呔商”。在民国初期，“呔商”的成就达到历史顶峰，仅乐亭县汀流河刘家在关外就有商号100多家。据1932年的调查，全县商户达5983户，从商人员占全县总人口的13.7%。据地方资料记载，到九·一八事变时，乐亭县在外经商者共拥有资金近4亿银元，年创利润5000余万银元，乐亭商人向家乡汇款最多时年达2000多万银元，仅30余万人口的乐亭县，赴关外谋生者达10万余人。在此过程中，“呔商”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那就是勤劳简朴、吃苦耐劳和诚实守信。从乐亭到东三省各地，距离几百到几千公里不等，交通不便，全靠步行。他们推车挑担，顶风冒雪，晓行夜宿，吃尽人间苦，洒尽离别泪。乐亭人做生意很精明，但讲诚信，人们深知若想生意做得长远，良好的口碑和信誉是第一位的。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岳父赵文隆、岳祖父赵良佐都是“呔商”。李大钊虽未踏上“呔商”之路，但“呔商”的优秀品质却深深地烙印在李大钊的精神根基上，并在他的一生中有所体现。

1. 一生勤勉，生活简朴

勤俭持家是乐亭人的优良传统，因为“呔商”大多是青壮年男性，创业之初很少拉家带口，盈利之后则寄钱养家，亲人深知其赚钱不易，因此精打细算，勤俭持家。李大钊深知“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道理，加之祖父的言传身教、耳提面命，以及乡亲们勤俭朴实作风的耳濡目染，他自幼便形成了勤勉、节俭和诚实的优良品质。李大钊一生勤勉，笔耕不辍，著书立说，宣传真理。建党之后，他为革命事业奔波不止，少有闲暇，直至牺牲。他推崇“箪食瓢饮”式的简易生活方式，从不追求奢华。他刚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月薪120元，在当时的北京来说属于较高的，1920年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后，再加上他的稿费，每月的收入约300多元，但他拿出大部分收入用于革命事业和资助他人，以致夫人赵纫兰难为无米之炊。李大钊真诚待人，乐于助人，尤其关爱困难学生和进步青年，经常慷慨解囊，赠衣赠食，但他个人却长期过着简朴清淡的生活。

2. 吃苦耐劳，乐观坚韧，白手起家，“零起点”革命

乐亭人“闯关东”基本上都是白手起家，创业之艰辛，难以言表。起初是人拉肩扛，一辆推车、一条扁担，走街串巷、沿途叫卖，天寒地冻、衣食无着，有多少乐亭人倒毙于求生的路上，又有多少乐亭人因经营不善而倾家荡产。但是，乐亭人凭借吃苦耐劳、乐观坚韧和无惧无畏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顽强地生活下去，并形成了规模浩大的“老呔商帮”，支撑起了东北民族工商业的半边天。这种白手起家的精神在李大钊身上同样有所体现。李大钊少年立志，矢志于救国救民，但他从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他出走《晨钟报》就是最好的例证。建党之初，缺乏党建经验，缺乏斗争经验，全部依靠摸索。李大钊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寻求一切可能的机会和力量，曾经与吴佩孚、胡景翼、冯玉祥接触，为党在北方的工作打开了局面。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上同样起到了积极作用。党的革命事业就犹如白手起家，可谓是“零起点”革命。在大革命失败前后，许多党员脱党、退党甚至叛党。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李大钊被反动政府通缉，但他没有考虑个人安危，一直隐匿在北京开展秘密斗争，直到被捕牺牲。当然，李大钊的革命精神首先来源于他的崇高理想，但是这种从零做起、白手起家、坚韧不屈的精神品质与乐亭文化有着明显的内在联系。

（二）崇尚文教，有着良好的人文环境

乐亭县自古文风鼎盛，教育发达，文艺繁荣，民间乡塾星罗棋布。自“金代置县至清末，全县出进士57人，举人282人”。据1903年的统计，按照当时清廷学部规定，将乐亭尊道书院改为乐亭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各乡村兴办了初等小学堂42所，此前的私塾共计有252处。当时乐亭县的人口大概在30万人左右，这样的教育资源在当时来讲可谓难能可贵。

1. 富集的文化资源和人才资源

李大钊是乐亭县丰富的教育文化资源的受益者。他所就读的大黑坨村的谷家学馆、小黑坨村的张家学馆和井家坨村的宋家学馆都是当时乐亭县民间私塾昌盛的代表。正是得益于乐亭县文化人才资源的富集，李大钊才能师从饱学之士，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基。当然，李大钊也发展了家乡教育，1919年，在他的主张和筹措下，建立了“国立大黑坨村初等学校”，这在当地传为佳话。另外，乐亭县也出现了史梦兰这样的著名学者，他一生著述颇丰，其藏书和遗著是后世宝贵的精神财富。李大钊曾特别提到：“乐亭史香崖（史梦兰）先生，学识渊博，藏书最富，闻有《图书集成》一部。”他特别提醒公家团体应该妥善保存史梦兰的藏书和遗著，以免“宏篇巨制，沦为断简残篇”。

2. 文艺之乡浇灌下的文艺才情

乐亭县是冀东的文化大县，也是艺术之乡，是乐亭皮影和乐亭大鼓的发祥地（评剧、皮影、乐亭大鼓被称为“冀东文艺三枝花”），当地还有乐亭大秧歌和民歌。李大钊自幼非常喜欢乐亭大鼓和乐亭皮影戏，这在李葆华和李星华的回忆录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在旧社会的乐亭，民间曲艺几乎是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是人民群众的宝贵精神文化食粮。李大钊对家乡曲艺非常钟爱。不仅如此，他还亲自改编剧目，赋予了旧曲艺以革命和进步的新内容。李大钊曾创作了乐亭皮影新剧目《安重根刺伊藤博文》，以此宣传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爱国主义精神。剧本写成之后，由乐亭著名皮影戏艺人孙兆祥将其搬上了影窗，此戏一出，备受广大群众欢迎，在乐亭县一炮而红。李大钊的文艺才情不仅局限于家乡曲艺，而且也展示在话剧上。话剧作为西方的“舶来品”，比较受城市青年的欢迎。1920年，李大钊受到北师大女学生李超死亡事件的影响，在义愤之中改编了新话剧《孔雀东南飞》，为古老的故事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女权思想。此剧本不仅刊登在陈大悲主编的《戏剧》杂志上，而且由李大钊亲自导演、北京女高师的几名女学生表演，将其搬上了舞台，演出非常成功，轰动京城。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新内容相结合，是李大钊在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一种新的尝试。

诚然，故乡文化在李大钊道德人格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奠定底色的重要作用。但是，他并没有受到家族和乡里经商致富传统的影响，而是决心“深研政理，振奋国群”。与日夜为生计奔波、闭目塞听的乡民们不同，李大钊始终怀有救国救民的强烈忧患意识和实现人类解放的远大理想，用新思想、新文化反哺故乡文化，创作或改编新剧本，把爱国主义、民主、平等、自由和妇女解放等思想植入艺术形式当中，影响广大城乡民众。这也是李大钊为故乡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

三、忠义节烈——夷齐精神的文化浸润

1905年秋至1907年夏，李大钊在卢龙县城的永平府中学堂求学。商朝时期，这里就是孤竹国的统治区域，著名的“夷齐让国”传说就起源于此。卢龙县城有许多关于伯夷、叔齐的名胜古迹，比如“夷齐里”“夷齐井”“清节庙”“首阳山”及“夷齐读书处”等地。李大钊在耳濡目染下必然会受到夷齐精神的熏陶，这在他的文字当中亦可寻得印记。他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曾言：“昔者改姓易代，兴亡倏忽，而一二遗老孤臣，不忍见宗社之倾，君父之辱，犹或黄冠草履，歌哭空山，乱礁穷岛，相望饮泣，亦欲抱残经于学绝之交，存正朔于危难之际，虽至势穷力尽，卒无变志灰心，杀身成仁，刎颈殉国，流离转徙，客死天涯。”可见，李大钊在忧国忧民之时眼前总能浮现出伯夷、叔齐的影子。

（一）赞赏忠义尽节之士

伯夷、叔齐最为人称道的操守不是谦恭让国，而是对殷商一以贯之的忠诚以及“不食周粟”的气节。李大钊深受传统文化影响，难免也有忠臣烈女的思想痕迹。他早年间曾言：“自古忠臣殉国，烈女殉夫，临危尽节，芳烈千秋，此其忠肝义胆，固可歌可泣，有足称者。”清初名臣魏裔介认为夷齐是坚守道统的首圣，所以“忠君”“尽节”就是夷齐精神的要旨。当然，“忠臣殉国”“烈女殉夫”等思想具有很强的时代性、阶级性和迷惑性，但也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要辩证地看待。虽然，在李大钊的文章当中几乎找不到有关夷齐的评论，但他对具有忠贞气节的夷齐式的人物却崇敬有加，比如，李大钊早年推崇明朝遗民朱舜水，敬仰其“贤士”之风。当然，李大钊推崇朱舜水还有一层原因，就是排满兴汉的民族情结。同时，李大钊也非常赞赏舍生取义的士君子精神。他曾感慨于鉏麑触槐而死的故事。他说：“夫麑，灵公之鹰犬耳，乃为民爱贤，为君守信，不惜杀身以殉。”鉏麑只是晋灵公豢养的一个打手，却心怀是非观念，见赵盾贤德而不忍加害，但又因违背君命，矛盾之下只能触槐而死，颇有夷齐风骨和国士之风。

（二）暗讽弃义失节之人

对于背信弃义、丢失节操之人，李大钊是持唾弃态度的。他曾言：“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范质和王溥同为周世宗柴荣的大臣，柴荣临终前，封范质为顾命大臣，辅佐幼主。赵匡胤陈桥兵变自立为帝后，范、王两人投靠新主，辅佐赵宋。范质一生为官清廉，生活简朴，家无余财，但是唯有背叛周世宗一事，成为他一生洗刷不掉的污点，故而宋太宗赵光义说：“宰辅中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者，但欠世宗一死，为可惜尔。”李大钊指出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对他们丢失气节持有批评和惋惜的态度。

（三）坚持礼义廉耻的基本道德观

孔子、司马迁和韩愈等均对夷齐精神大加称赞，夷齐精神为儒家所弘扬，形成了儒家礼义廉耻的基本道德观。李大钊在《风俗》一文中就批判了当时中国社会道德风气的颓靡不振、浊流横行、清流难觅、礼义廉耻四维不张等现象。他引用了顾炎武《日知录·廉耻》中的一段话，即“灵均去国，犹冀改俗，之推仕人，尚知明耻宁……无独醒之人”。顾炎武在《日知录·廉耻》中引用《五代史·冯道传·论》中对礼义廉耻的观点，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冯道，五代时人，历仕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及后周，共五朝十君，人称官场“不倒翁”。“冯道现象”恰好印证了顾炎武所说的“五季之陋”，风俗大坏。当然，在危难和乱世之中，亦有可圈可点之士。屈原已经被楚王放逐，却仍然心怀改革和强大楚国的宏愿。颜之推身处北朝乱世，政局动荡，与冯道处境极为相似，却能保持应有的廉耻感和道德底线。

（四）对夷齐精神的超越与升华

不可否认，夷齐精神中有许多可以继承和弘扬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夷齐文化。因为夷齐的做法本身就存在问题，比如为殷商守节，漠视天下大势和民心所向，愚忠愚孝，这是不可取的。李大钊自幼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纲常名教之类的训条不能说对他早年思想没有影响。他在早期文章中也曾表露过“忠臣烈女”式的传统观念，但他并没有走愚忠愚孝的老路。他既没有像梁济（梁漱溟之父）和王国维那样殉清或殉道，也没有为哪家军阀政府效忠，而是为了国家、民族和亿万同胞，为了共产主义而英勇献身。其气节高尚，志存高远，是对夷齐精神的巨大超越。

四、筑声剑影——燕赵文化的精神风骨

自西周初年，召公姬奭受封于蓟，就萌生了燕赵文化。燕赵文化是我国一种比较成熟的地域文化，有其独特的核心价值、文化结构和传承。燕赵地处北方，自然环境相对恶劣，造就了民风彪悍、仗义豪迈的性格。乐亭县地处冀东，“县民悲歌慷慨，犹存燕赵遗风”“乐邑人情，急公好义，士守廉隅，民勤操作”。李大钊自幼深受燕赵文化的浸润，并在传承的过程中实现了对燕赵文化的某种超越与弘扬。

（一）“筑声剑影”的燕赵文化情结

李大钊自幼熟读《史记》，对荆轲刺秦王和高渐离击筑之事烂熟于心，且一度将此二人视为自己的精神偶像。他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筑声剑影楼”。“筑”就是高渐离袭击秦始皇所用之物，是战国时期比较流行的一种击弦乐器，形似古筝；“剑”就是荆轲刺秦王之短剑。荆轲和高渐离均是燕国义士，亦为好友，慷慨歌于燕市，悲歌别于易水，最后他们均死于刺秦失败，尽显燕赵慷慨悲歌之风骨和豪侠任义之精神。当时，20岁左右的李大钊正当青春韶华，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视列强为强秦，因此在精神上与荆轲和高渐离等豪侠义士同气相连，以为人生榜样。李大钊在《登楼杂感》诗二首中就有“久居燕市伤屠狗，数觅郑商学贩牛”的诗句。“久居燕市”符合李大钊当时“久居津门”而想一展抱负的心态，同时他也想学习郑国商人弦高那样智退敌军，为国出力。在李大钊津门求学这一时期，他的诗稿分别以“筑声剑影楼剩稿”“筑声剑影楼诗”命名，有两篇文章则以“筑声剑影楼纪丛”命名，这些说明当时燕赵文化精神在李大钊思想中曾占据过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对燕赵文化精神的超越和弘扬

一直以来，燕赵文化就以“慷慨悲歌”著称。荆轲也好，高渐离也罢，慷慨悲歌并不是指江湖游侠的那种快意恩仇和个体情怀，而是指在国家危亡之际，为挽狂澜于既倒而不惜生命、拼死一搏的决绝勇气和牺牲精神。因此，荆轲、高渐离虽为江湖游侠和市井优伶，但心存大义，堪为国士。李大钊非常准确地继承了这一点，并且在许多方面对“慷慨悲歌”的燕赵精神还有所超越和弘扬。首先，李大钊好侠而不任侠，豪迈而不放纵。荆轲、高渐离等人毕竟生活在战国末期，那时天下离乱，任侠成风。加之北燕之地，民风彪悍粗犷，与儒家的温良恭俭让之精神颇有不合之处。李大钊生活于清末民初，自幼受到纲常名教、礼义廉耻等传统教育。身上虽然流淌着“慷慨悲歌”的文化血液，但举止行为彬彬有礼、温文尔雅，是谦谦君子，既无任侠之风，亦无放纵之态，更与街头巷尾、市井坊间的江湖人物不同。在儒家精神的熏陶下，在革命精神的洗礼下，李大钊将燕赵文化中的侠义精神升华成为国为民、杀身成仁的大义精神。应该说，李大钊在大义面前不输慷慨悲歌之士，在小节方面又远胜之。其次，李大钊用实际行动超越了燕赵文化精神。荆轲、高渐离等虽为义士，其实际作用和能量却比较有限，所谓“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而已。但李大钊不仅为革命英勇献身，还影响和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使他们加入到中国共产党和革命队伍中来，这其中有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张国焘、高尚德、何孟雄、张太雷、朱务善等，相当一部分人后来成为我党的中流砥柱和杰出领导人。李大钊并非是荆轲那样仗剑天涯的孤胆英雄，而是一位专门培育伟大革命者的“助产士”。可见，挽救国家危亡绝不能够依靠少数精英，而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燕赵文化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乏对英雄人物的讴歌，但真正的英雄是人民群众，李大钊是国内最早阐述并公开信仰“民彝史观”的思想家，这也是他对燕赵文化的超越与弘扬。

深入挖掘故乡文化对李大钊伟大人格的塑造作用，有利于我们继承和弘扬大钊精神，发展和繁荣大钊故乡文化，坚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浇灌中国大地，不断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者为天津科技大学教授、博士，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会员）

滦州拧紧年轻干部“纪律弦”

本报讯（张子卓）为帮助年轻纪检监察干部练好“内功”、提升修养、增强本领，滦州市纪委监委组织开展年轻干部警示教育读书班，通过“学、警、谈”三位一体教育模式，引导年轻干部常照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镜子、系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时刻牢记铁规矩、硬杠杠。

在理论学习环节，紧扣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核心要义，将理论学习与实践感悟紧密结合，并结合典型案例剖析，从强化政治淬炼、夯实信仰根基、加强纪律约束、严实作风养成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号召青年干部以过硬作风擦亮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学习结束后，学员们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围绕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分享自己的学习感悟与心得体会，纷纷表示要全面深入检视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学促行，牢记党员初心，以优良作风赢得群众支持和满意。

为进一步提升警示教育效果，推进以案为鉴、以案释法，此次读书班将警示教育“课堂”搬到唐山市党员干部警示教育展馆，通过一桩桩发生在身边的贪腐案例、一张张发人深省的忏悔录、一则则令人肃然起敬的廉洁故事，让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零距离”深刻感受违纪违法带来的惨痛后果。

近年来，滦州市纪委监委持续将廉政教育融入年轻干部教育管理监督中，坚持正面引导和反面警示同向发力，结合年轻干部岗位性质、成长特点，在新入职、提拔任用等关键节点，通过组织廉政座谈会、签署岗位廉政承诺书、进行廉政知识测试和组织观看警示片、阅读忏悔录、旁听法庭庭审、参观警示教育基地等方式，按需施教、精准滴灌，实现廉政教育与干部成长同频共振，护航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我们将进一步健全年轻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工作机制，持续把廉政教育贯穿于年轻干部‘选育管用’全周期，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帮助年轻干部在严管下成长、在磨砺中成才。”该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曹妃甸综保区“双喜临门”

（上接第一版）将曹妃甸打造成为华北最重要的跨境电商基地，助力唐山跨境电商产业创新发展。

在曹妃甸至俄罗斯TIR国际公路运输线路首发仪式上，唐山曹妃甸飞腾源博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龚承威说，公司十多年来致力于国内外冷链及散货物流运输业务。今年2月，取得国际公路运输资质，成为TIR持证人。TIR系统是联合国授权全球管理唯一的全球性跨境货运通关系统，在全球拥有78个缔约方，包含超过3万家有资质企业。相较传统公路运输，TIR运输全程不换车不倒装，“点对点”运输，节省80%的时间和38%的成本。

据曹妃甸综保区负责人介绍，曹妃甸至俄罗斯TIR国际公路运输线路的首发，是河北省首次开展TIR跨境公路运输业务，标志着“曹妃甸—欧亚”TIR跨境公路运输线路正式开通，将为河北共建“一带一路”再添新通道，为唐山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注入新动力。